

负增长:是喜?是忧?

——关于上海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

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

执笔:朱国宏

一、引言

人口学家所从事的学科是在人口空前增长时期发展起来的,他们对于如何对付人口减少毫无经验(Peter Pirrie, 1985)。而人口减少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作为一个现实问题,人口减少的威胁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在当时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恐慌,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遗憾的是,这种关注大多来自经济学者,他们中有凯恩斯、汉森、哈罗德、缪尔达尔等(J. Overbeek, 1974)。而人口学者对于人口减少及其后果关注甚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欧人口增长的回潮,发展中地区的人口“爆炸”,所有对人口的关注似乎都转向了人口增长及其后果。人口减少问题被忽视了。

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增长已开始趋于减慢,不仅发达国家相继出现零人口增长或负人口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家庭计划运动的广泛开展和不断取得成效而出现生育率的显著下降。于是,人口减少或减慢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特别是人口学者的关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而引致的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不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引出了一系列研究(顾宝昌, 1992)。

中国作为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发展中国家,其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近年来也开始被注意,并引发了一些初步的研究(顾宝昌和彭希哲, 1992; 朱国宏, 1992)。

然而,研究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首先必

须研究作为中国生育率下降最早地区的上海,而对于上海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研究,尚属罕见。

上海,在中国,是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国内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地区。不仅如此,在1991年,市区人口还出现了自然负增长,预计在1994年前后全市人口呈现自然负增长状态(陈先准, 1992)。生育率下降的后果在上海不仅显现,而且正在成为现实问题。作为这些后果的一个标志,负增长,究竟是喜?是忧?

二、上海人口负增长:偶然还是必然

负增长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相对于封闭人口而言的自然负增长,另一是指相对于开放人口而言的绝对负增长。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考虑迁移因素而后者则考虑迁移因素。不考虑迁移因素时,人口增长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动,即自然变动;考虑迁移因素时,除出生率和死亡率外,还取决于迁移率的变动,即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因此,在封闭人口条件下呈现负增长的人口,在开放人口条件下不一定呈现负增长。

质诸上海人口,由于上海之于其它地区存在着迁移联系,在人口状态上应属于开放人口。只是,对于建国以来40多年的上海人口来说,一则迁移受到严格控制,二则进入上海的人口受到户籍的限制,因而,说上海人口是完全的开放人口,抑或是介于开放人口与封闭人口之间的户籍人口更为恰当。事实上,在人口统计中,所谓自然负增长也是特指户籍人口的负增长,而不是前述封闭人口意义上的自然负

* 研究组成员有:乔晓春、穆光宗、张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吴忠(北京大学)、朱国宏(复旦大学)。

增长。之所以这样做,一来可能是为了统计上的便利,二来也是由于迁移量较总人口很微小。当然,在进行历史考察时,应当注意到特殊时期的较大规模的迁移,如50年代的干部“下放”,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知青回城”,等等。

那么,以户籍人口作为统计对象的上海人口负增长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是偶发现象还是必然趋势?

在市区已经形成而全市也即将形成的上海人口负增长,无疑是上海自建国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然而,从上海人口发展史上看,这并非首次。负增长作为一种人口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出现过,如1929年和1930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低达-2.0‰和-1.5‰(胡焕庸,1987)。不过,这次负增长与即将形成的负增长,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二者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前者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下,后者则处于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下;前者发生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后者则发生于经济繁荣、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其次,二者的人口状态不同。前者为开放人口,迁移频繁,迁出迁入的变化量大,而后者则为半开放人口,迁移受到严格的控制。最后,二者形成的原因不同。前者主要由人口性别比偏高,从而婚姻率低所致(张开敏和周海旺,1993),而后者则主要由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的转变所致。

并且,即将形成的上海人口负增长也与1960年中国人口负增长不同。中国1960年出现的负增长,是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形成的,是时中国适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衰退之中,是为特殊时期的产物,而且为期只有短短的一年。而即将形成的上海人口负增长则不同,不仅所处的时代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的90年代初,而且,以市区人口为例,负增长已经出现两年,预计仍将持续下去,并波及全市人口,并非偶然发生。此其一。

其二,中国1960年出现的人口负增长,自然增长率由1959年的10.19‰下降到1960年的-4.57‰,变化幅度多达14个百分点,带有明显的突变性质。而上海人口的负增长,自然增长率由低水平下降到更低水平,是一个自然变动的缓慢过程,变动幅度很小,具有渐变性质。以市区人口为例,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2.81‰下降到1991年的-0.06‰,变化幅度不足3个百分点,由1991年的-0.06‰再降到1992年的-1.16‰,变化幅度仅为1

个千分点多一点。

其三,虽然中国人口负增长和上海人口负增长均由死亡率高出出生率所致,但在变化方向上有着明显不同。中国人口负增长主要由死亡率的突然升高所致,从1959年到1960年,死亡率由14.59‰猛升到25.43‰;而上海人口负增长则主要由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所致。1990—1992年间,市区人口出生率由9.83‰下降到6.81‰再降到6.16‰,与此同时,死亡率变化不大,1991—1992年间死亡率甚至由6.87‰上升到7.32‰。

最后,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的情况下出现的,1960年二者均超过20‰;而上海人口负增长则是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较低的情况下形成的,1991年,市区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均低于7‰。

所有这些区别意味着,即将到来的上海人口负增长将不同于曾经出现过的中国人口负增长。它不是一种偶发现象,而是预示着一种人口变动的未来趋势,因而,它不可能像1960年的负增长那样昙花一现,旋即恢复正增长,而是能持续下去。根据预测资料,2000年以后,直到2085年,上海人口的自然增长将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张开敏等,1990)。这意味着,上海人口发展已开始进入人口减少时期,上海如果继续严格控制迁移和控制人口增长,将出现人口不断减少的局面,而这种人口减少,又将带动其它人口要素的变动,从而引出一系列人口减少问题。

三、负增长如何形成:上海人口转变

即将形成的上海人口负增长既不同于上海1929、1930年的人口负增长,又不同于中国1960年的人口负增长,它不是特殊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偶发现象。而预示着一种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那么,这种负增长是如何形成的呢?

前已述及,负增长是由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而形成的。如果负增长不是由特定社会经济条件所造成的,那么,作为人口变动长期趋势的反映,它就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对演变所造成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演变,在长时期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表现为一个有序的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可依其变化的特征而归结为不同的演进阶段,每一阶段间的演进被称为人口转变。

按照从西欧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对演变的经验历程而归纳起来的人口转变理论观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演变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静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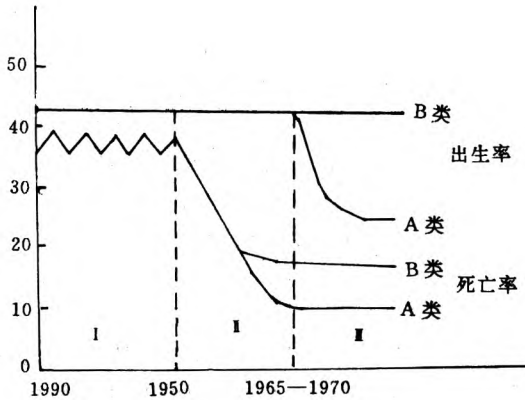


图1 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两种类型

资料来源：M. P. Todaro(1985)

早期扩张、后期扩张、现代静止和减退。这一系列转变过程，又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所谓现代化，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而，即工业化、城市化和社化，其中，工业化是主导，城市化、社化是工业化兴起后才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工业化是人口转变，特别是出生率转变的关键因素(R. A. Easterlin, 1968)。目前，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大多已进入现代静止阶段，西欧一些国家甚至已进入减退阶段。

然而，根据西欧人口转变经验归纳出来的这一理论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历程与这一模式并不完全吻合，因而形成了新的人口转变模式。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大致可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早期扩张阶段与西欧模式相同，但之后，并未出现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生率也开始下降的后期扩张，而是在死亡率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才开始出生率的下降；第二种类型，早期扩张阶段与西欧模式相同，但之后，既未出现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的出生率下降，也未发生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表现为出生率始终维持高水平，死亡率则在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开始波动。这两种类型分别如图中的A类和B类所示。

这意味着，在不具备工业化条件从而不具备城市化和社化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死亡率有可能完成转变(如A类)，但出生率即使能够转变，也只能达到一定程度，而无法进入完成阶段。更多的甚至是，死亡率只下降到一定程度，而出生率始终居高不下(如B类)。

如果考察中国的人口转变，那么，不难发现，

中国人口转变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类型，但也具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在50年代，如A类发生转变，死亡率直降至很低水平，而出生率持高不降，但之后，出生率仍未发生转变，而维持着近10年时间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直到70年代才出现图中A类的第Ⅲ阶段，并且，在出生率下降至20%左右时出现波动(80年代)(朱国宏，1989)。

那么，上海的人口转变历程如何呢？

将1950年以来的上海出生率、死亡率变动情况绘出如图2。40多年的人口转变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第Ⅰ阶段，极高的出生率和很低的死亡率，相当于发展中国家A类的第Ⅱ阶段。第Ⅱ阶段，大致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是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时期，死亡率有所上升，出生率跌幅较大，可视作特殊阶段；第Ⅲ阶段，大致在1961—1965年间，死亡率处于波动状态，出生率由30%以上水平下降至20%以下，可看作是转变阶段，如果除却1959—1961年间的特殊时期，1961年似乎正是50年代末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的延续；第Ⅳ阶段，1965年以后，死亡率继续波动，而出生率则处于20%以下的低水平波动，直到1990年，其中80年代初波动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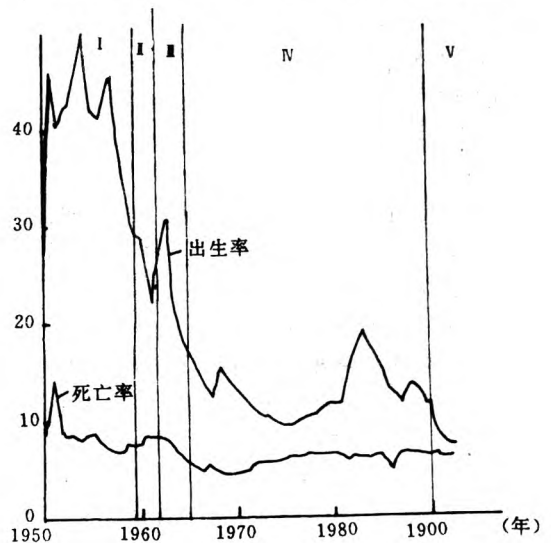


图2 上海人口转变历程

资料来源：胡焕庸(1987)；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1990、1993)；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89)。

大,主要由50年代生育高峰所形成的年龄结构凸部使然,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转变完成阶段;第Ⅴ阶段,1990年以来,死亡率仍在波动,而出生率更臻下降,从趋势看直指减退阶段,但在发达国家,减退阶段多发生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均超过10%的水平处,而上海则发生在10%以下,这里姑称为“后转变阶段”。

上海人口转变的这一历程,与西欧模式相比较,主要的不同在于死亡率。在出生率尚未转变的50年代,死亡率已降至10%以下,这一水平相当于西欧模式的现代静止阶段。而出生率的转变过程与西欧模式相同,可以将第Ⅰ阶段看作原始静止,第Ⅲ阶段看作早期扩张和后期扩张,第Ⅳ阶段看作现代静止,第Ⅴ阶段看作减退。

与发展中国家模式、中国模式比较,最大的不同仍在于出生率,那就是,中国出生率下降至20%左右时出现波动,而上海出生率却直降至20%以下才出现波动,而其水平可视为转变完成。

于是,问题也就在于,第一,为什么在出生率持高不降时,死亡率能够直降至很低水平?第二,上海出生率为什么没有在20%左右时出现波动?

对于第一个问题,理由已如许多研究所揭示的,主要在于全球性的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传播。至于第二个问题,可能主要是由于,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尽管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其现代化状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言而喻的,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化程度也具备了,因而可能象西欧模式那样,出生率由高水平一直降至低水平,直到20%以下水平时才出现波动。

和西欧模式比较,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出生率由高到低在西欧国家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而上海则不到10年。其原因主要是,上海除了具备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化等现代化条件外,在出生率下降过程中,还有着人口控制的外来推动,因而出现出生率的更快下降。这种人口控制的外来推动从50年代末开始,在60年代初得到加强,70年代更进一步强化,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口生育素质、生育行为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胡焕庸,1987)。

其实,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基础,加上人口控制的推动,出生率可以下降更快,幅度更大,并一直下降到转变完成阶段,这已为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验证。如新加坡,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上海有着

多方面的相似之处,而其人口转变历程也是相似的。其相通之处就在于,出生率是在具备一定现代化基础上开始下降,并都受到人口控制的外来推动,而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上海是一座特大城市。因此,可以认为,上海人口出生率由高降到低,直到转变完成阶段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进一步说,当人口转变经历一段时期的转变完成阶段波动后进入“后转变阶段”,即第Ⅴ阶段,从而形成人口的负增长,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四、上海生育率下降特征及其人口学意义

从人口转变历程可以看到,即将到来的上海人口负增长,实际上是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相对地,死亡率始终处于低水平的波动状态,变化不大。

如果说出生率变动更多地受年龄结构的影响,那么,总和生育率的变动,因其不受年龄结构的影响,而更能反映生育率的真实变动。上海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50年代为4.75(其中,1950—1954年间为5.02,1954年为5.44),60年代为2.83,70年代为1.44,80年代为1.29,1992年为1.33。这一变动历程意味着,上海的总和生育率由50年代的5.02下降到70年代的1.44,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三分之二,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足以用急剧下降来描述,而7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始终在1.5之下,又意味着较长时期的持续低生育率。如果将总和生育率为2左右视作人口更替水平的标志,那么,从7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发展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之下,这意味着负增长的形成是必然的。如果不是50年代生育高峰的周期影响,可能在80年代中后期已经出现负增长,因而可以预计,在这种周期影响结束后的90年代后期及之后,将出现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正如人口预测所表明的那样。

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变动相比较,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更早、更快、幅度更大。上海在60年代,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2.83,而全国直到70年代末才降至这一水平,这一水平之下,上海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而全国出现波动,以致于在1982年甚至回升到2.86的水平,因此,可以认为,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比全国平均水平早10年以上。而且,上海从50年代的4.75下降到60年代的2.83,平均每年下降5.05%,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由5.87下降到5.68,平均每年仅下降0.04%;上海从60年代的2.83下降到70年代的1.44,平均每年下降6.53%,而同期

全国平均水平由 5.68 下降到 4.01, 平均每年下降 3.46%。

生育率变动的直接人口学后果, 一是改变人口增长速度, 另一是重塑人口年龄结构。就前者而言, 上海生育率下降比全国平均水平更早、更快、幅度更大, 意味着上海人口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更早减慢, 减慢速度更快, 减慢幅度更大。正因为如此, 当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高达 2.8%(1965) 的时候, 上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低到只有 1%(1965); 而当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高达 2%(1973) 的时候, 上海已降低到只有 0.7%。1992 年,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6%, 相当于上海 1965 年的水平。上海 1992 年自然增长率只有 0.12%。

上海生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下降更早、更快、幅度更大, 在年龄结构上的影响是, 变化更早、更快, 程度也更大。在 50 年代前期, 上海人口年龄金字塔和全国相似, 同属于正金字塔形, 上尖下宽。50 年代末开始,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 金字塔底部有所收缩; 60 年代以后, 生育率不断下降, 金字塔底部不断收缩; 到 70 年代末, 已基本形成腰鼓形金字塔的雏形。而全国人口的年龄金字塔, 除了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特殊年份对金字塔的影响外, 整个金字塔的底部, 直到 70 年代才开始收缩, 而且收缩幅度远小于上海。这样, 从少年儿童人口(0—14 岁)比重看, 1953 年, 上海为 32.03%, 全国为 36.27%, 二者相差仅为 4 个百分点左右, 差距较小; 而到 1982 年, 上海减少到 18.16%, 全国仅减少到 33.60%, 二者相差 15 个百分点之多, 差距已大为拉开。事实上, 直到 1992 年, 全国仍高达 28%, 远高于上海 1982 年的水平。

再从老年人口比重(65 岁以上)看, 1953 年, 上海为 1.97%, 全国为 4.41%, 上海竟不如全国平均水平; 而到 1982 年, 上海上升到 7.43%, 全国仅上升到 4.91%, 远低于上海。事实上, 直到 1992 年全国仅上升到 6%, 仍低于上海 1982 年的水平。

人口增长速度减慢和年龄结构变化的这些特征意味着, 它们既直接受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又必然对未来人口发展造成深刻影响, 从而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后果。

五、人口负增长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负增长的形成是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 因而负增长可能带来的后果, 也就是生育率下降的后果, 或者说是持续低生育率的后果。

生育率下降在人口学上的意义, 如前所述, 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增长速度的减慢, 另一是年龄结构的变化。而这两个方面的变化, 所带来的后果, 首先在于人口发展本身, 然后又通过这种人口变化, 影响到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宋国宏, 1992)。

人口增长速度的减慢, 首先意味着人口增长压力的缓解, 尽管它并不意味着人口压力的减轻或消解。高速增长形成的人口压力, 由于增长速度的减慢, 使得人口压力增大的势头得到遏制, 从而缓和了人口压力所引起的各种紧张态势。此外, 人口增长速度的减慢, 意味着人口倍增时间的延长, 使得人口再生产的速度放慢, 推迟了人口增长的时间表。对于上海来说, 由此而引出的社会经济后果, 从积极方面说, 缓解了高速增长的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压力。如所周知, 由于 50 年代的人口高速增长, 上海人口不断膨胀, 已经形成对上海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庞大压力, 表现在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人均绿地面积小、水电资源短缺等诸多方面, 而由于人口增长的减慢, 使得这些方面的紧张局面的加重势头得到遏制, 因而, 从某种意义上说, 缓解了这些方面的紧张局面, 为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从消极方面说, 人口增长的减慢, 在未来几十年里可能出现劳动力的短缺问题, 特别是考虑到上海的未来可能的大发展, 这种劳动力短缺问题, 可能构成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人力发展问题。

不过, 生育率下降的后果更多地可能还在于年龄结构方面, 即使是前述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也可归入年龄结构问题之中。前述, 生育率下降和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是年龄结构发生转变, 这种转变表现在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上。从积极方面说, 这种转变, 是调整年龄结构的契机, 使得年龄结构类型由增长型或年轻型转变到稳定型或成年型, 有利于未来的人口稳定发展, 但是, 这种转变是在高速增长之后发生的, 因而使得年龄结构的转变带有突变性, 变化幅度较大, 又将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发展。特别是考虑到, 上海生育率下降比诸全国平均水平更早、更快和幅度更大, 因而, 年龄结构上的变化幅度也更大, 从而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也更大。

由年龄结构这种转变特征所引出的人口发展后果, 主要是影响到未来年龄结构的金字塔特征, 其结果是人口发展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 时快时慢, 而这又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必须经常调整以

适应这种变化的要求。譬如,人口增长快时,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规模必须相应扩大,以适应生育高峰的要求;而人口增长慢时,这些设施的规模又须相应缩小,以适应低生育率的要求。而这种调整不仅仅是设施问题,还有人员配备、经费计划、配套安排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生育率下降既然是塑造年龄结构的手段,那么,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必要注意使年龄结构避免过多过大的起伏,这样,也就有必要采取相应手段使生育峰期错开平滑,以塑造比较稳定合理的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通过不同年龄组人口比重的变化而发生。由不同年龄组人口比重变化引出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劳动适龄人口负担的方向发生变化。随着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下降,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劳动适龄人口的负担由主要负担少年儿童人口转向主要负担老年人口;其次,劳动适龄人口负担的比例也将发生变化,在年轻型的年龄结构下,劳动适龄人口比重较大,转向成年型时,负担比例下降,而再转到老年型时,负担比例再次提高;最后是劳动适龄人口本身的比重下降。由这些后果引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也与三个不同年龄组的人口比重变化相联系。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相联系的是少年儿童的出生、培养和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均涉及社会的许多方面,如前述的学校问题;与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相联系的是劳动力资源问题和劳动适龄人口的负担问题,前者影响一个地区的长期发展,后者影响个人和家庭,从而也影响社会;与老年人口比重相联系的是人口老化问题,人口老化问题包括老年健康医疗、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就业、老年娱乐等多方面,这些方面自然也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就上海而言,由于其生育率下降更早、更快、幅度更大,上述这些后果不仅都存在,而且将比全国平均水平在程度上更严重。这些后果,有的已经初露端倪,亟须引起重视。其中突出的有以下两个问题:

1. 人口老化问题

对于上海来说,和负增长相联系的首当其冲的紧迫问题就是人口老化问题。目前上海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如果以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老龄化的标准,那么,早在1982年上海人口就已进入老龄化时代。所以说,人口老化,作为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后果,在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生育率下降的急剧和持续的低生育率,上海人口老化的来势将更猛也更严峻。人口

老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许多发达国家也早已进入人口老化时代。问题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而上海的人口老化是快速的,而且幅度很大。1990年上海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0%。据预测,到2000年以后,上海人口老化速度将大大加快,老年人口比重在2000年达到14%,2020年达到22%,2030年达到31%(张开敏等,1990)。到2030年,上海可能是世界上人口老化最严重的一个城市。事实上,早已出现老化问题的法国,直到现在老年人口比重不过14%,而它早在本世纪初就已进入人口老化时代。这段历程,上海仅需10年时间就走过来了,由此可见上海老化速度之快。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比重最高的是瑞典,也不过18%,低于上海2030年的水平。

在上海,与进入人口老化时代相应,人口老化问题已经出现,老年就业、老年社会保障、家庭养老、老年娱乐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这只不过是初步的。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更为严重的老化态势,有必要及早筹措对策。

2. 独生子女问题

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相伴随的是生育率下降,与生育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口控制条件下的“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上海已经连续10多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由此也形成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独生子女问题。这一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已经出现并引起关注。然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独生子女问题,既包括独生子女的培养、教育等问题,又包括独生子女成长为劳动力以后的负担问题和养老问题,还包括独生子女的家庭问题。譬如,目前上海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比只有40%,到2000年上升到42%,到2020年达59%,而到2050年更上升至76%。这意味着独生子女一代成为劳动力后,其负担比其父辈要重一倍左右。

六、结论及问题的讨论

1. 上海人口负增长的必然性

上海即将在1994年前后形成负增长,这种自然负增长以市区人口的负增长为先兆,到1994年以后将出现持续的长期性的人口负增长,除非采取非常措施加以干预。

上海人口负增长是在其人口转变过程中由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持续的低生育率造成的,而不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因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2. 上海人口转变及其特征

上海人口转变从建国以后开始考察,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除特殊时期外,其它四个阶段依次为转变前阶段、转变阶段、转变完成阶段和后转变阶段。上海之所以率先完成人口转变主要是由于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人口控制推动并加速了人口转变过程。

3. 上海生育率下降特征

比诸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生育率下降更早、更快、幅度更大,在人口转变过程中表现为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持续的低生育率。

4. 上海生育率下降的后果

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持续的低生育率使上海人口增长不断趋于缓慢,也使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人口增长压力的势头得到遏制,人口倍增时间不断延长,而年龄结构也由年轻型或增长型转变到成年型或稳定型。

5. 生育率下降中的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上海的生育率下降具有比全国更早、更快和幅度更大的特点,生育率下降中形成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开始出现。主要有劳动力短缺问题、人口老化问题、独生子女问题等,以及由此而引出的涉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

6. 上海人口负增长是喜? 是忧?

作为生育率下降从而是人口转变的结果,人口负增长反映着人口长期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一种必然现象。其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育行为转变的标志,从而是文明进步、现代化的标志,堪喜!从另一方面说,它又反映了上海人口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对对中国人口控制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人口增长压力的缓解作出了地区性的努力,同样堪喜。

然而,负增长是上海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急剧下降和持续低生育率的结果,它又引出一系列人口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又因其速度快、幅度大而日显严峻。从这个意义上说,负增长又堪忧?

也许应当说,如果说负增长是必然趋势的话,那么,这将是人口转变中的每个国家都将无法规避的,其问题的严峻性可能正类同于高速增长的人口问题。但是,如果说上海人口负增长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其生育率下降的急剧和十分低下的生育率的持续。这两大特征,使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出现得更早、来得更快,也更为严重。这一点,从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出。

如果说劳动力短缺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引进劳动力来解决的话,那么,人口老化问题和独生子女问题并没有类似的解决办法。可供采用的对策,从人口方面说,一则在适当时候考虑调整生育政策,以减缓未来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二则适时地对年度生育计划加以干预,错开生育高峰,以保持未来年龄结构的稳定化。但更多的,也许应当未雨绸缪地考虑未来人口问题的社会经济对策,在长远规划上,在政策倾向上,在制度上,建立一系列相应的策略。毕竟,事在人为。

主要参考文献:

- 陈先准,1992,“现代人口转变的先例”,《人口》,第4期。
- 顾宝昌,1992,“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研究方兴未艾”,《人口》,第1期。
- 顾宝昌和彭希哲,1992,“伴随生育下降的人口态势(摘要)”,《人口》,第1期。
-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198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胡焕庸(主编),1987,《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张开敏(等编),1990,《上海人口前景展望》,百家出版社。
- 张开敏和周海旺,1993,“上海人口发展及其分布的过去、现在和展望”,《人口》,第1期。
-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编),1990,《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90)》,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中国人口数据表(1993)》。
- 朱国宏,1989,“人口转变论——中国模式的描述和比较”,《人口与经济》,第2期。——1992,“生育率变动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 Blacker, C. P., 1947, “Stages in Population Growth”, 《The Eugenics Review》, No. 3
- Easterlin, R. A., 1968,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 Overbeek, J., 1974, 《History of Population Theories》, Rotterdam University(中译本见奥威毕克著《人口理论史》,商务版,1988年)。
- Pirrie, P., 1987, “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农业系统研究”, 《农村生态系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Todaro, M. P., 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中译本见托达罗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版,1988年)。